

策略性框架与框架化机制： 乌坎事件中抗争性话语的建构与传播

周裕琼 齐发鹏

内容提要 变迁、结构、话语是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的三大宏观因素，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对变迁和结构的研究已经颇多，但从传播学角度对话语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对抗争性话语的形式和内涵进行了概念化，以田野调查、深入访谈、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数据为基础，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乌坎事件中的话语展开了实证考察：其一，在乌坎独特的传播生态中，出现了哪些形式的抗争性话语？其二，乌坎村民如何通过“策略性框架”来实现集体行动的社会动员？其三，海内外媒体如何通过“框架化机制”来报道和诠释乌坎事件？乌坎事件为我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话语博弈场景，而其中村民利用自媒体平台实现的话语赋权尤其引人注目。

关键词 抗争性话语 乌坎 框架 媒体 集体行动

一、引言

2011年发生的乌坎事件，内地媒体定调为“乌坎转机”，^[1]香港媒体等海外中文媒体喻之为“新农民运动”，^[2]西方媒体则多次使用“起义”（revolt）一词形容村民的抗议行为。^[3]对同一事件不同版本的讲述，既是媒体受意识形态、机构、组织、个人等层面影响的必然结果，^[4]同时也可以视作媒体通过“框架化”（framing）机制主动介入社会运动的有力证据。毋庸讳言，在当前中国，媒体的关注程度和报道角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到个人维权、大到群体性事件的成败得失。与厦门PX、上海磁悬浮、番禺垃圾焚烧等以城市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抗争事件不同，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农民因其所能调动的媒介资源有限，不得不采用最原始最激烈的手段来引起社会关注，以至在多地出现流血骚乱。这种高成本的路径依赖，在乌坎长达百日的抗争过程中，也曾被复制，但最终被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乌坎转机”名副其实。

乌坎事件，不仅对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来说是难得的案例，更是为传播学者考察社会抗争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素材。耐人寻味的是，时隔两

年多，不但乌坎村民的土地诉求仍然悬而未决，而且学术界对乌坎事件的研究也相当零散，与当初媒体对事件的热烈报道及讨论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一次抛砖引玉的尝试，本文围绕着抗争性话语这一核心概念，以田野调查、深入访谈、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数据为基础，展开三方面的考察：其一，在乌坎独特的传播生态中，出现了哪些形式的抗争性话语？其二，乌坎村民如何通过“策略性框架”来实现集体行动的社会动员？其三，海内外媒体如何通过“框架化机制”来报道和诠释乌坎事件？

二、抗争性话语

与荷兰学者梵·迪克（van Dijk）开创并被广泛应用于新闻学研究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不同，^[5]在社会运动研究中，“话语”不是作为一种“工具”，而是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赵鼎新认为，变迁、结构、话语是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的三大宏观因素。^[6]其中，关于话语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于建嵘把“抗争性政治”视作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基本问题。^[7]我们认为，任何形式的抗争性政治都伴随着一定的抗争性话语，具体而言，抗争性话语是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参与者利用各种人际、群体以及大众的渠道建构与传播的符号集合。

抗争性话语形式库

梯利（Tilly）曾经把一定时空内一个群体所熟悉和能运用的抗争方式总和（比如狂欢、葬礼抗议、抢粮、砸机器、抗捐抗税、怠工、叛乱、罢工、静坐、示威、游行和恐怖活动等无形的反抗活动）总结为“集体行动形式库”（repertoire of collective action）。^[8]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抗争的行为形式，都必定伴随着一种或多种抗争的话语形式，即“抗争性话语形式库”（repertoire of contentious discourse），包括但不限于谩骂、呼告、演讲、标语、口号、横幅、谣言、意见书、公开信、帖子、博客、微博、歌曲、纪录片、视频等文字、声音和图像形式。研究法国革命的一批学者提出“历史即剧本”，即历史是舞台，而社会行动参与者是演员，他们依据特定的文化剧本来建构抗争性话语。^[9]在不同的时空和文化背景下，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所能调动的抗争性话语形式也有所不同。为了更好地分析文化对社会运动的影响，赵鼎新曾经提出了“文化资源库”（cultural repertoire）这一概念，它不仅涵盖了梯利的集体行动形式库，而且包括了在一定时空内一个群体发起抗争所能利用的文字性和符号性资源，^[10]在我们看来，这新增加的部分就是前面所界定的抗争性话语形式的总和，即，“抗争性话语形式库”。

在中国近年来的社会抗争行动中，出现了一些基于中国特定政治文化背景的集体行动形式，比如上访、跪拜领导、拦车喊冤等。城市中产阶级、工人、农民等各种抗争主体所熟稔的集体行动形式不尽相同。即便采取相同的行动，所涉及到的抗争性话语形式也大不相同。以环境抗争为例，在广州番禺，城市中产阶层业主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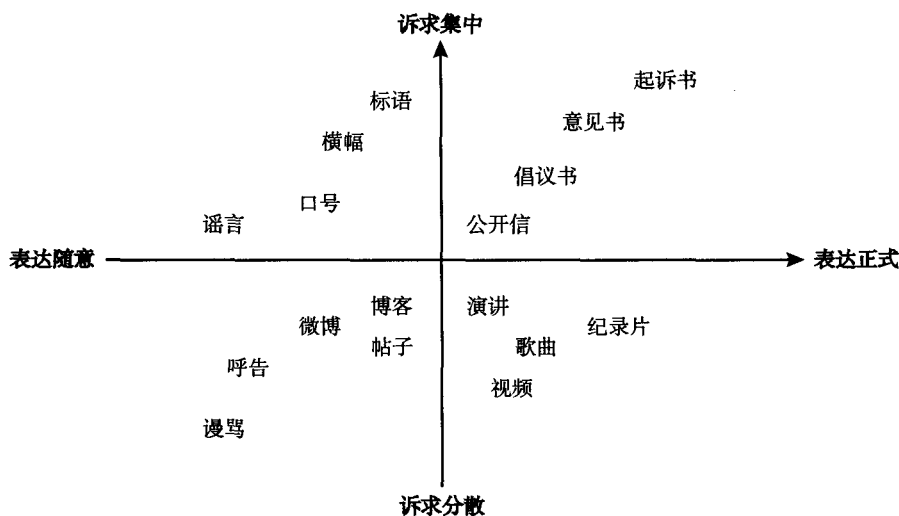


图1 抗争性话语形式库

行上访、“散步”、行为艺术时，多配合以理性而书面化的抗争性话语形式，比如他们将环保口号制作成车贴、文化衫，将环保诉求改编进诗词歌赋，并先后起草了十余份公开信、倡议书、意见书、起诉书来反映意见、表达抗议、提出建议。^[11]在浙东海村，村民却选择了拦路、打砸、跪拜等原始抵抗形式，所使用的抗争性话语形式也多为即兴随意的漫骂和呼告，难以被复制传播。^[12]如图1所示，我们把抗争性话语的不同形式按照诉求集中/分散和表达正式/随意两个维度进行分类：漫骂和呼告等形式，诉求最为分散且表达也最为随意；而起诉书、意见书等书面文件，诉求最为集中且表达也最为正式；介乎它们之间的是演讲、口号、博客等形式的抗争性话语。

策略性框架 (Strategic Framing)

利用不同形式的抗争性话语，行动者们试图建构社会运动的话语框架，实现自我定义和社会动员。所谓框架，是由戈夫曼 (Goffman) 提出的一个微观社会学观念，它能帮助人们建立“诠释的基模” (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认识、理解和标记周遭的世界。^[13]甘姆森 (Gamson)、本福德 (Benford) 和斯诺 (Snow) 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将框架视角引入社会运动研究，指出行动者们需要通过框架化过程建构社会运动的意义。^[14]集体行动框架可以根据其功能分成三类：1. 诊断框架 (diagnostic frame)，帮助行动者定义问题和发现原因，比如反核能运动将核危机的主导原因归结于道德沦丧、国防工业、资本主义或美苏冷战；^[15]2. 预后框架 (prognostic frame)，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方案，比如反死刑运动的解决方案有两种，一种认为应毕其功于一役，废除死刑，另一种则主张一个一个打官司，能救一个算一个；^[16]3. 鼓动框架 (motivational frame)，鼓舞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到行动中来，

比如众多强调污染的严重性、环保的紧迫性、行动的有效性和正当性的环保标语。^[17]这三类框架对于集体行动的共识动员（consensus mobilization）和行动动员（action mobilization）来说至关重要。

具体而言，通过讨论（discursive processes）、策略（strategic processes）和竞争（contested processes）这三种互相交织的流程，集体行动的框架得以提出、确定和完善。^[18]其中，贯穿始终起统领作用的就是策略性框架过程。斯诺等人认为，一个社会运动背后的目标或意识形态由于各种原因可能很难被目标群体所接受，为了更好地动员参与者，组织者往往会创造出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话语。这种有意识、有目标、策略性地达成共识的框架整合过程，即策略性框架。^[19]具体实现途径有五：1. 框架搭桥，把两种或更多框架关联起来，比如支持堕胎的人把自己和女权运动关联起来；2. 框架扩大，美化现有的社会价值和信念，比如在新种族主义运动中，白人分裂主义者就借用“爱”、“骄傲”、“遗产保护”等美好的词汇来粉饰其“白人至上”的主张；3. 框架延伸，将利益范围扩张到其他潜在的支持者，比如反全球化浪潮在不同人群与国家的蔓延；4. 框架转变，改造旧框架甚至用新框架来替换它，比如黑人女性主义运动让公众重新认识到美国黑人群体中女性被强奸问题的严重性；5. 框架借用，这是赵鼎新基于对中国社会运动的考察提出来的一个新概念，特指缺乏理论武器的弱势群体借用一个与他们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不相符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或话语来做框架，^[20]黎相宜则根据自己对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的抗争行为的考察，指出不仅草根向精英借用框架，同样精英也会向草根借用框架。^[21]总而言之，集体行动的全过程，就是通过上述途径，不断地建构、选择、包装、整合抗争性话语，实现策略性框架，达到社会动员的过程。

框架化机制（Framing Mechanism）

策略性框架不但对行动者内部的动员至关重要，同时，还有可能经由媒体框架构建（media framing-building），^[22]来实现对社会民众的动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维权”成为众多群体性事件的首选框架：^[23]一方面，它能得到参与者的迅速响应，实现内部动员；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了诉求的“合法性”，从而避开了新闻报道的选题雷区，赢得更多媒体版面。极端行为或许能吸引最初的媒体关注，但就抗争性话语的建构而言，只有娴熟利用各种策略（比如合法化策略、暗示“责任归属”的策略、动员政府部门的策略）来保证诉求的政治正确性，才有可能在媒介上赢得框架竞争。^[24]而在网民主导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策略性框架往往会从关注个体所受伤害转向诉求社会公平正义。显然，后者比前者更有可能对分散在各个角落的网民进行情感动员，同时也能在更大程度上吸引媒介的持续报道与深入讨论，从而使事件升级为议题，并有可能进入媒介和政府的议程。

集体行动者和媒体之间存在互相利用的关系，前者向后者提供素材，后者向前者提供版面，在两者互动交易的过程中，前者试图建构后者的新闻框架，而后者受

制于宏观（意识形态）、中观（机构、组织）和微观（记者的个人特征、新闻价值观等）因素，遵循“框架化机制”对集体行动进行选择性地传播，甚至介入到社会运动的再造中去。^[25]如果说，行动者是通过“策略性框架”来建构内部共识、实现社会动员的话，那么媒体则是通过“框架化机制”在更广义的社会情景下解读集体行动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寻找背后的原因、做出道义的评估、给出对策建议。恩特曼（Entman）提出了新闻框架的四大功能：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义评判、对策建议。^[26]这四大功能与行动框架的三大功能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其中，问题定义和因果解释对应诊断框架，对策建议对应预后框架，但道义评判和鼓动框架不能等同。

在媒介霸权和新闻专业主义的作用下，行动者对媒体的框架构建效果日益式微；反之，媒体对社会运动的介入不断凸显。吉特林（Gitlin）对美国1960年代新左派运动的研究显示，主流媒体对学生所使用的抗争性话语的选择性报道，“造就”并最终破坏了新左派运动，在运动的晚期，组织者不得不以“制造”新闻事件、“表演”集体行动等出格的方式来博取媒体版面。^[27]在中国，由于绝大多数集体行动都是“无组织、有纪律”，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行动者几乎不可能实现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此时，熟谙官方底线、擅长打擦边球的新闻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就起到了运动的组织、动员作用。孙玮对厦门PX事件的分析就显示，大众媒体通过探寻“我们是谁”，在厦门人以及环保主义者中建构了“崭新的、内涵丰富的”集体认同感，体现了新社会运动的历史性生产力。^[28]

抗争性话语概念图

如图2所示，我们从两条路径上对抗争性话语进行概念化，一方面，是受到政治文化影响的“抗争性话语形式库”，它与“集体行动形式库”对应，共同组成了具有传承价值的“文化资源库”；另一方面，是体现行动者理性选择的“策略性框架”，通过整合三大框架（诊断、预后和鼓动框架），实现对参与者的共识动员和行动动员。

图2还对抗争性话语与媒体报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概念化。一方面，行动者试图将抗争性话语输入媒体，构建媒体的报道框架；另一方面，媒体遵循框架化机制，在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义评判、对策建议四方面帮助社会大众理解集体行动的同时，也帮助行动者在更广义的范围内实现了社会动员。此外，敏锐的行动者还有可能根据媒体框架来策略性地调整自己的话语框架。

三、数据采集

在阐释“抗争性政治”定义的时候，学者于建嵘曾批评“底层无政治”的精英主义政治观，指出应该“以底层社会的眼光看待底层民众的行为”。^[29]这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局限，在抗争性话语研究中同样显而易见。“底层无话语”，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多从媒体对集体行动的报道来考察抗争性话语，很少追溯到行动的源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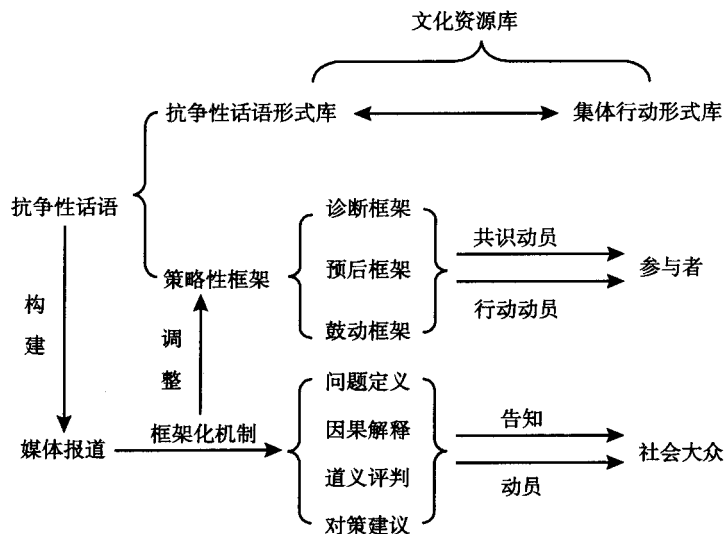


图2 抗争性话语概念图

从行动者的角度来解读抗争性话语。为了避免这一局限，我们使用质化与量化方法，分别采集了行动者、行动场域和媒体的数据：

首先，关于行动者，我们在2012年2月至2013年2月期间，以面访和QQ聊天的方式对数十位村民进行了深入访谈。此外，从2011年12月开始，我们追踪观察了乌坎贴吧、村民微博、博客和QQ群。与此同时，我们还收集了海内外媒体访谈乌坎村民的文字和视频，作为文本分析的材料。

其次，关于行动场域——乌坎村——我们先后在2012年2月17日至3月4日、5月26-30日、2013年2月23-25日三次走访乌坎村，进行田野调查，尤其侧重观察村内传播生态以及村民对新旧媒体的使用情况。

最后，关于媒体，我们以慧科新闻为数据库，^[30]检索2009-2011年期间所有内容含“乌坎”的新闻报道，剔除与“乌坎事件”无关的内容，共计得到789篇中文媒体报道，其中，大陆媒体304篇，香港媒体319篇，澳门媒体27篇，台湾媒体59篇，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外国媒体报道80篇。围绕着恩特曼所提出的四类框架（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义评判、对策建议），我们对媒体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

四、乌坎村的传播生态

在乌坎事件爆发后，海内外媒体蜂拥而至，对这个拥有1.3万村民的半农半渔村庄的历史与现状（尤其是土地流转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但很少媒体注意到乌坎事件背后的传播生态，那些由众多传统/现代、人际/群体、官方/民间传播渠道

交织形成的公共领域。借鉴丁未对深圳石厦村所采用的“社会空间地图法”，^[31]我们以田野调查所采集到的数据为基础，将乌坎事件中直接起到村内宣传动员、村外信息扩散的三十几处重要的传播“点”以及上演各类“社会运动剧目”的重要场所进行了标识，绘制了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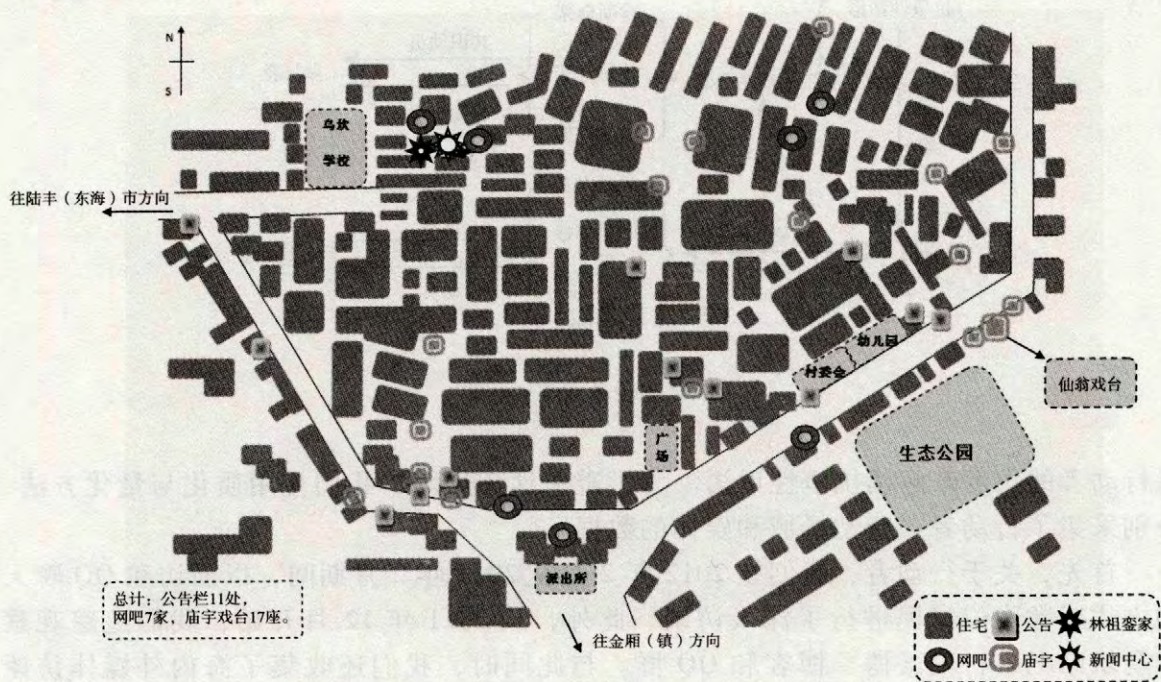


图3 乌坎村宣传动员与信息扩散地点分布图

公告（栏）：共计11处，主要分布在环村的主干道上，用来张贴大字报、标语、通知、告示、讣告、宣传单、捐款财务清单等。

网吧：共计7家，其中1家现暂停营业。价格1-2元/小时，拥有电脑20-40台不等，都配有摄像头、耳麦、话咪，现场测得网速基本在1M左右。3家网吧位于主干道，临街开店；2家靠近乌坎学校，正好在林祖銓家和新闻中心旁边；2家隐匿在村内的小巷之中，熟客才能找到。网吧用户大多是学生，躲着父母上网玩游戏。但在事件中，他们却成了乌坎的代言人，从互联网上突围，把村内的抗争情况传播出去。按照16岁少年吴吉金（网络绰号“鸡精”）的说法，“乌坎的网吧就是我的战场”。^[32]乌坎事件还促使了网吧的装备升级，有老板告诉我们，“这事件闹的，村里很多细佬仔过来上网，去年（2011年）底的时候，这一排排全坐满了，他们嫌机器不好，想着那时候他们也是给村里人帮忙发消息，不仅没收他们的钱，还趁过年把电脑给换了。”

庙宇戏台：共计17座，大多在1980年代以后修建，祈求渔民出海平安，并与

村内的宗族祠堂（姓氏公屋）有一定联系。受潮汕文化影响，庙宇与戏台共生，香火鼎盛、好戏连台。村民表示：“村子被香火的青烟缭绕，一年有300天能听到戏台上咿咿呀呀的潮剧”，“大家忙时赚钱，闲时拜神”。其中，位于东南角的仙翁戏台（对面是华光庙）是乌坎村最重要的地标，同时也是乌坎事件中静坐、示威、游行、竞选演讲、理事会选举等抗争性行为和话语的主要发生地。

乌坎广场：乌坎村旧电影院前的一个小广场，是村内静坐示威、召集游行的主要场所，也是各种街谈巷议的集散中心，相当于一个开放的民间“议事厅”。薛锦波猝死之后，村民在此设立灵堂，上千村民前来悼念，众多意见领袖在此发表演讲。

林祖銓家：乌坎事件的领导者、后当选为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的林祖銓家庭所在地，三层楼民居。在乌坎事件中，一楼成为临时代表理事会开会、接受采访、发表声明的场所；二楼成为“临时指挥部”，有四台电脑，用于监控林家周围的9个摄像头，并通过三个对讲频道分别与林祖銓、理事会和热血青年团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也是“乌坎电视台”（WKTV，民间性质）的制作基地。

新闻中心：紧邻林祖銓家的一栋三层楼民居，因家人外出打工，在乌坎事件中被暂时租用为新闻中心，住宅内可免费使用无线网络，便于写稿发稿，人数多时有超过30名海内外记者暂居于此，日均人流量上千。村民捐赠炊具和食物，并有6名妇女志愿为记者们做饭。

上述六种传播场域，几乎都是非官方的，它们或衍生于传统文化（庙宇戏台），或滥觞于市场经济（网吧），或俗成于日常村务（公告栏、广场），或是村民根据抗争形势自发组建（临时指挥部、乌坎电视台、新闻中心）。在乌坎事件中，派出所和村委会遭遇多次冲击，人员全部撤出，乌坎陷入“无政府”状态多日，但全村仍然秩序井然，信息的内部流通与外部传播都有章法，主要仰赖的就是这些非官方传播场域。

五、乌坎事件中的抗争性话语形式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乌坎事件的发生是多年累积矛盾的大爆发。从考察社会抗争的角度而言，我们选取2009年6月第一次上访至2011年底广东省工作组进驻宣布重选村委会这段时间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时期抗争行为和话语的形式与特点，我们将这两年半的时间分成三个阶段：2009年6月21日至2011年9月20日是乌坎事件的前期，针对以薛昌为首的村支部和村委会变卖土地问题，村民先后上访十余次未果，开始酝酿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2011年9月21日至12月10日是乌坎事件的中期，声势浩大的集体上访（游行）演变成持续的警民冲突，诉求未能得到陆丰市政府的有效回应，村民努力争取媒体的同情；2011年12月11日至12月31日是乌坎事件的后期，薛锦波之死激化了抗争形势，村民呼吁更高级权力机关的介入，省工作组与村民代表谈判，诉求得到回应，抗争和平结束。在抗争的不同时期，村

民先后采取串联、上访、请神、游行、静坐、募捐、选举、打砸、集会、罢市、罢渔、追悼（类似于葬礼抗议）、拦路等抗争性行为，组成了一个具有中国农村特色的集体行动形式库。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抗争性话语形式库。

表 1 乌坎事件不同阶段的集体行动和抗争性话语形式

| 抗争阶段 | 主要任务 | 集体行动形式 | 抗争性话语形式 |
|---------------------------------|------|-------------------------------|--|
| 前期 2009. 6. 21 - 2011. 9. 20 | 共识动员 | 串联、上访 | QQ 群聊、信访材料、公开信、签名（摁手印）、传单、短信 |
| 中期 2011. 9. 21 - 12. 10 | 行动动员 | 拜神、游行、静坐、集会、打砸、募捐、选举、罢市、罢渔、停课 | 锣鼓、占卜、签名（摁手印）、标语、横幅、口号、旗帜、谣言、演讲、对联、短信、歌曲、纪录片、博客、微博 |
| 后期 2011. 12. 11 - 12. 31 | 官民博弈 | 静坐、集会、拦路、哀悼 | 标语、横幅、口号、谣言、短信、挽联、讣告、告媒体书、演讲、博客、微博 |

在乌坎抗争的不同阶段，任务有所不同：前期侧重于在村民中达成共识，形成共同规范；中期侧重于鼓动尽可能多的村民参与到抗争中来，壮大声势；后期则侧重于“依势博弈”，在官民谈判中争取最大的利益。作为社会抗争的两大重要表现形式——行动和话语——在不同阶段也各有侧重。表 1 总结了乌坎事件中集体行动和抗争性话语形式库，下面我们将分阶段展开讨论。

在乌坎事件前期，QQ 群聊是最值得关注的抗争性话语形式。乌坎事件的早期，参与者大多是 80 后甚至 90 后，比如庄烈宏（1983 年生）、张建城（1985 年生）、洪锐潮（1985 年生）、张建兴（1991 年生）。被剥夺了土地后，这些只有初中文化的年轻人不得不常年在外打工，勉强谋取生计。根据社会运动学者提出的“人生易受性”概念（biographical availability，即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来自全职工作、婚姻和家庭责任的牵挂与限制相对较少，参与社会运动的风险与成本也相对较少），^[33]他们正是乌坎上万村民中最有可能发起社会抗争的人群。外出打工的经历不仅增长了他们的见识，而且也使他们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传播技术（ICT）。2009 年 2 月，匿名“爱国者 1 号”建立了“乌坎热血青年团”（后改名“乌坎爱国青年团”）QQ 群，号召大家把群号“发送给你身边的乌坎人！让更多人加入进来，乌坎村才有希望取得胜利！”该群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到数百人，随后两年，扩张成一个主群两个副群，成员上千，其中还包括不少在校中小学生。根据特纳（Turner）的突生规范理论（emergent norm theory），集体行动的产生需要某种共同的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或共同的愤恨，而这种共同心理形成的关键是聚众中某个共同规范的产生。^[34]因村民无法在线下公开聚集讨论村务，QQ 群聊直接促成了共同规范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共识动员”功能。乌坎事件的第一份传单《给乌坎村乡亲们的一封信——我们不做亡村奴》就是由“爱国者 1 号”起草散发的，同样，乌坎村民的第

一次上访也是在群里约定时间。乌坎的年轻人在群里热烈讨论土地贪污问题，并共享他们从不同渠道得到的证据，包括内部协议、政府批文、占用耕地清单等等。群里置顶的两个文件，一个是《国际人权公约》、一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一位早期就加入QQ群的村民告诉我们：“其实，光看网名，谁都不知道背后是谁，一个一万多人的村子，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也不多，加上一个群有200人，有时候讨论起来特别激烈，就更分不清你我了。但在乌坎事件前期，就是靠QQ群把人心笼络起来的，很多消息都是依靠群来发布，那时候政府还没有监控，大家都是畅所欲言。”

为了实现行动动员，在事件中期，在乌坎的广场和庙宇戏台等公共领域，上演了丰富的社会运动剧目。与之相应，各种原始的（锣鼓、占卜）、常见的（标语、横幅、口号）以及新奇的（歌曲、纪录片）话语形式交相辉映，使得乌坎抗争呈现出与大多数农村群体性事件不同的精神气质。宗姓力量和神灵崇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乌坎村民的日常生活，塑造了他们的集体意识。乌坎村有47个姓氏，每个姓氏有一面铜锣，平时用于法事、喜事和拜神，9月21日临时起意的集体上访，就是通过敲响姓氏铜锣召集起来。11月21日筹划已久的再次上访，更是以神前占卜下来的旨意作为先导，从神庙请出“真修仙翁”的令旗，和一面铜锣一起，系在队伍最前方的摩托车头，引导四千人队伍的行动进退。尽管其符号象征意义远多于实际意义，神灵的“庇佑”使得乌坎村民的游行更为庄严从容。

延绵不尽的标语和横幅，以及握拳嘶喊口号的村民，是媒体上最常见的乌坎抗争影像。9月21日的集体上访来不及制作标语与横幅，口号也是即兴喊出的。次日的警民冲突使得更多的村民意识到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从9月23日开始，在仙翁戏台、广场等主干道，不断有村民聚集静坐，大家自发地喊起了口号：“人多力量大，喊口号是为了团结，越喊越有劲，越喊越生气，原村委为官不仁，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开始的时候，啥事都不知道，只能聚在一起商量。到后来，事情弄明白了，肯定黦（生气），大家就希望有人带着讨说法。”9月29日，以宗族姓氏为纲，村民自行选出民意代表，并成立了13人的“临时代表理事会”，集体行动有了统一的领导，口号、标语、条幅的内容根据抗争的形式不断进行策略性调整。与陆丰市政府近两个月的谈判没有实质性进展，理事会决定再次召开村民大会，讨论抗争策略。在11月20日的大会上，村民们拟定了次日游行的口号和标语，除了之前的土地诉求（“还我祖先耕地”、“誓死保护耕地”、“地在人在，地没人亡”等），还加入权利诉求（“反对独裁”、“还我人权”、“惩治腐败”等）。杨色茂表示：“我们反对的是‘乌坎皇帝’薛昌的独裁统治，他的框架还在那里，至今大而不倒，随时有可能死灰复燃。我们要的是法定权利，要求归还村务管理权、选举权。”^[35]停课

后，乌坎的中小學生也来到理事会办公室帮忙写标语做条幅。旧的还来不及揭下来，新的就挂了上去，乌坎的主要街道成了标语和横幅的海洋。理事会还制作了许多印有斗争口号的彩旗，使得11月21日的游行，成为一次色彩斑斓、和平热烈的表诉。

情感共鸣对行动动员来说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乌坎村民借助多媒体所做的尝试尤为引人注目。2011年9月至11月，一首名叫《情系乌坎》的歌曲在乌坎流传开来，以Michael Jackson的《地球之歌》作为曲子，重新填词：“我的故乡，失去朝阳……不靠神仙皇帝，只靠我们自己，不靠神仙皇帝，反腐在哪里……”使用台式电脑的随机麦克风录音，这首朴素的歌曲唱出了作者庄烈宏的“切肤之痛”。后来，张建兴又用绘声绘影软件编辑了一个更抒情版本的《情系乌坎》：“我爱的故乡，我的思念，我时常梦里，感受田野的朝气……漂流异乡的孩子，你甘知我等，梦里的呼唤，故乡无助的双眼。”无论是“痛”还是“爱”，这两首歌都句句打在了村民的心上，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利用村民捐款，张建兴花8300元从深圳华强北买来了摄像机，做起了“公民记者”，自己采访、自己拍摄、自己编辑完成了两部时长约1小时的独立纪录片。第一部《乌坎！乌坎！誓保祖地》以追溯历史开头：“自公元1600年远在康熙时期，开启了乌坎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400年来从一个两户人家的渔村发展到现在1万多人口的城市化农村，可不幸于官商勾结，腐败的统治一手遮天之下，官商们业绩辉煌，百姓生灵涂炭，豪车高楼，又怎么是荒凉”，回顾了十余次上访的历程，重点记录了9月21日前后乌坎村的影像。第二部《乌坎！乌坎！》旨在鼓舞村民展开更大规模的反抗：“2011年11月20日-2011年11月25日，为誓保祖地，乌坎全民，停业、停海、停市6天。让夕阳的血红染遍大地，让冬夜的星星异常闪亮，让我们期待那一刻，凯旋的歌声会响彻世界的每一角落。”在抗争低潮期，这两部纪录片在乌坎广场循环播放，每天有上千村民观看，斗争的士气不断高涨。此外，纪录片还免费发放给前来采访的记者，并通过Youtube在海外扩散。

在乌坎事件后期，薛锦波死讯传来，已经没有退路的乌坎村民转而寻求更高权力机关（省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注与同情。这时候，信息突围显得尤为重要。“那段时间，村内的消息外面一点都不知道，国内的记者进不来，好不容易进来了回去还不敢如实报道，大家都人心惶惶的，我们这几家临街店铺，都把煤气罐放在门口，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内地媒体不能报就找海外媒体。和广东大部分地区一样，乌坎村民也是从小看着香港的电视长大的，而从乌坎迁往香港的有5000多人。所以，有人在QQ群中提议找到香港的乌坎人，“他们或许能帮助我们联系到香港的媒体，让香港记者进村报道”。随着乌坎形势的恶化，中国香港以及美国、英国、日本等众多海外媒体记者蜂拥而至，为乌坎赢得了国际关注，但也容易被指“勾结海外势力”。作为回应，乌坎村民在新闻中心旁边张贴了多份中英文《告媒体朋友书（To the media friends）》：“乌坎村很高兴可以见到这么多的媒体人员，对于我村事件，还请正面报道，避开‘起义’，‘起事’等字眼，我们不是起义，我们拥护共产党，我们爱国家。”据张建兴回忆，英文版是他通过“金山词霸”翻译获得，尽管翻译得不是很完美，但意思已经显而易见了。

在乌坎青年人眼中看来，或许自己为自己代言最可靠。通过在微博、博客等各

种“自媒体”上发布乌坎抗争的最新消息，“热血青年团”的成员们兴奋她表示：“我们在打一场新闻仗”。账号被“和谐”后再次申请，网络断掉之后再安装，张建兴说自己一共有“5个QQ账号、7个微博账号、4个Gmail账号、4个Skype账号、2个Twitter账号、N个手机号，加上Facebook，Blogger，VPN”，总有办法把消息发出去。16岁的少年吴吉金表示：“村里的网路断过，后来又来了，那时候大家盼着记者进村，可是没人来啊，来了的也不好好报（道），都说假（话），大家没办法，只能自己想（办法），我不是最早开微博的，（张）建兴他们早一些，我的账号也是熊（伟）老师给介绍出去的。开始，没想过自己有什么能力帮助村子。再后来，好多人粉我，我的粉丝越来越多，也就慢慢学着不断更新微博、转载有关乌坎的消息了。那阵子，记者一进村就到处找我，我有点怕，但是还是挺高兴的，好像跟个大人物似的，有时候我说的话也会有人认真听。”

从被动等媒体，到主动找媒体，再到自己做媒体，原本在话语权竞争中属于“弱势群体”的村民经由新媒介实现自我“赋权”，在与政府的博弈中掌握了更多的筹码。这一点在11月21日游行消息的传播中体现最为明显。此前，陆丰市政府试图通过拉拢分化等手段将乌坎危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村民大会决定游行之后，乌坎人立刻在网络发布了题为《“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计划组织村民于11月21日游行上访，并请中外记者报道》的帖子，打乱了官方的部署。乌坎青年对游行的全过程进行了“网络直播”，又使得陆丰市政府试图将游行形容为“少数人的不满”的做法徒劳无功。

最后，还有必要讨论谣言这种“替代性新闻”（alternative news）在乌坎事件中的表现。谣言，并非一定是“谎言”，而是未经证实却广为传播的人们现实世界的假想^[36]，或人们在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improvised news），^[37]它填补了官方及媒体公信力沦丧所造成的空白。在乌坎，村委会的权威早已荡然无存，更高一级的陆丰市委也很快让村民失望。9月21日千人游行的消息出现在陆丰市委宣传部网站时，不但人数被打了一折，而且性质也被抹黑为“少数村民聚众滋事”。村民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谣言这种“弱者的武器”来造势、借势、用势，对抗官媒的失实报道。^[38]因此，在这场“民谣”突围“官谣”的战斗中，流传最广的谣言都是敌意型谣言（wedge drivers，像楔桩一样嵌入人群，制造对抗），^[39]比如，“特警打死学生”、“全村断水断电”、“薛锦波死于刑讯逼供”、“另有两名被关押村民死亡”、“解放军坦克压境”。布鲁默（Blumer）认为，聚众的形成需要通过集体磨合——集体兴奋——社会感染三个阶段，而谣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处于不安与焦躁的群体在传播和讨论谣言的过程中，形成共同的愤怒情绪，并最初促使集体行为的爆发。^[40]这些谣言加强了村民内部的团结，也通过“以讹传讹”的方式争取到外部的舆论同情。比如，听到“解放军坦克压境”传闻的村民就表示“他们有枪，我们有石块。他们想要我们死，我们也不怕”。^[41]而这则谣言经由海外媒体转发出去，建构

了“围观”民众对事件的“社会想象”，有网民因此发布《就陆丰乌坎事件告解放军全军官兵书》，香港媒体也发表了多篇评论，声援乌坎村民。但谣言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如奥尔波特（Allport）和波斯特曼（Postman）所言，“从未有一场骚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42]在乌坎9月22日的警民冲突中，写在白布上的“警察打死2个小孩”谣言令村民情绪失控，围攻派出所、掀翻警车，理性抗争演变为暴动骚乱。

六、乌坎事件中的策略性框架

在任何集体行动中，组织者的首要任务都是要将抗争的原因、目标与意义尽可能地让群众说明。即便对于职业社会运动家来说，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乌坎事件中，老（以“40后”林祖奎为代表）、中（以“60后”杨色茂等为代表）、青（以“80后”庄烈宏等为代表）三个年龄层的行动领导者，是如何通过策略性框架来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的？策略性框架在乌坎事件不同阶段的抗争性话语中的表现是丰富多彩的，为讨论方便，我们仅在表2中列出了最显著最核心的内容。

表2 策略性框架在乌坎事件不同阶段抗争性话语中的表现

| 抗争阶段 | 领导阶层 | 主导框架 | 实现途径 |
|---------------------------------|---------------|------------------------|--------------|
| 前期 2009. 6. 21 - 2011. 9. 20 | 青年 乌坎热血青年团 | 诊断框架 乌坎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 | 框架搭桥 |
| 中期 2011. 9. 21 - 12. 10 | 中年 临时代表理事会 | 鼓动框架 团结起来想办法！ | 框架扩大 框架延伸 |
| 后期 2011. 12. 11 - 12. 31 | 老年 林祖奎 | 预后框架 怎样和政府谈判争取最大利益？ | 框架转变 框架借用 |

在乌坎事件前期，“乌坎热血青年团”主导了抗争性话语的建构，在QQ群中，他们讨论的重点是“乌坎怎么了”和“为什么会这样”，这恰恰对应了诊断框架的两个核心问题。青年人尽管没有丰富的阅历，但是却拥有足够的热情支撑着他们去搜集各种证据、研读法律条文。经过讨论，“爱国者1号”在《给广东省政府的一封公开信（乌坎村百姓“联名信”）》中指出，“从无公正民选过，凭势力而霸当40年的村委书记等村干部”通过“官商勾结开发、滥卖土地，利用公款投资工厂、养殖业、私炒地皮”，使得乌坎“几十万平米的良田和土地不翼而飞”，将乌坎的土地问题直接归因于官商勾结腐败和基层选举不公。在随后多次上访中，这封公开信经过反复修改，增加了法律条文作为佐证：“他们这种可耻的作风严重违反了《广东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二条和《广东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三十条。”写给政府的公开信力求有理有据，而写给村民的公开信则更侧重于描述官员的贪婪腐败：“村官‘大人’深怕一旦失去村官，丑陋的罪行随之而暴露。为了掩盖这一切罪行，村

官‘大人’只好一直霸占村官这个位置，活到老、当到老、贪到老。这也够‘难为’村官‘大人’了，一大把年纪，还在为家乡‘钱途’而操心！”在不断讨论对内和对外的《公开信》的过程中，“乌坎热血青年团”建构起最初的抗争性话语，并通过框架搭桥，将土地问题与腐败问题关联起来，成为乌坎抗争的主导性“诊断框架”。

2011年6月，先后10余次上访未果的青年人找到了曾经在深圳等地做工厂干部、最近回乡发展的中年人杨色茂。关于乌坎的问题及背后原因，青年人和中年人之间很快达成了共识，可是如何解决问题，双方的想法却不同。杨色茂认为青年人的上访尽管精神可嘉，但在利益集团的强大影响下，很难得到积极回应。他想到的解决方案是“民主选举”，并短信群发了自己的竞选大纲。为了对抗强大的村委势力，无论是上访还是选举，当务之急还是要发动群众。所以，在抗争的中期，杨色茂、薛锦波等中年人（9月29日选出的13人“临时代表理事会”、10月22日成立的“妇女代表联合会”）和“乌坎热血青年团”共同配合，旨在建构有说服力的鼓动框架。这就必须向村民说清楚以下几个问题：1. 问题有多严重；2. 形势有多紧迫；3. 行动能否有效；4. 行动是否正当。

当青年人带领村民喊出“我们不做亡村奴”、“还我土地、还我祖业”等口号的时候，已经部分回答了前两个问题。一位村民站在“为后代负责！万众一心”的条幅下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坎村的抗争已经是别无选择：“乌坎村的今天已经这样了，我们不能让乌坎村的后代没有房住、没有饭吃、没有地种。”在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屡被打压的大背景下，如何向村民说明行动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却有待恰当的时机，需要充分的智慧。9月22日的警民冲突中，不少平民百姓（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被打受伤。村民将4幅警察打人的照片、11幅伤者的照片和1幅乌坎村的旧景照片拼在一起，制作成5米长的条幅，配上文字“我所崇拜的人民特警，却对我这个懵懂少年狠下毒手。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否还有天理？你们的职责是不是残忍和蛮横？这现已成为我童年的残酷阴影，试问争议和天理何在？”通过框架扩大，他们将乌坎的抗争与“天理”、“正义”等价值信念相结合，强调了抗争的正当性。

与此同时，乌坎抗争的组织者还通过框架延伸策略，将传统上以男性为主导的抗争延伸到女性，向村内妇女说明参与抗争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在全村的妇女大会上，台上的“妇女代表联合会”与台下众多村民一问一答，建构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平等”的鼓动框架：

问：“昨天镇政府有人下来说，我们组织什么妇女代表会，女人可以做什么，你觉得我们女人有没有力量？”答：“有！”

问：“能不能做事？”答：“能！”

问：“所以希望这件事情出力的不单单只是男人，妇女也是有力量，也是要负一半责任的。女人也是半边天是不是？”答：“是！”

问：“……我们老社会女人能做的便是才，要在家里做家务，不能在外面说话

的。是不是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我们女人是不是不能站在外面说话？”答：“平等的、平等的！”

总结：“既然是平等的，我们女人现在也有知情权，也有参与权。所以我希望我们村所有女士来参加我们这个联合会，在我们村目前发生的这个事，老人、小孩、妇女发挥的作用，并不是说比男人少。”^[43]

框架延伸策略不仅将利益范围扩张到不同人群，同样将利益范围涵盖到不同诉求。比如，为了强调抗争的正当性，把“维权”框架从物权（土地、财产）延伸到人权（选举、民主），在11月21日的游行中打出了新标语、喊出新口号。当天的集体上访展现了高效的组织能力，整个游行和平有序、丰富热烈，不但令乌坎村民信服，而且也给中外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游行促使更高一级的政府部门（汕尾市政府）介入调查。12月9日，汕尾市政府在免除原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并回应村民土地诉求的同时，又将薛锦波等五人刑拘，并宣布“临时代表理事会”和“妇女代表联合会”为非法组织，乌坎抗争陷入僵局。

在乌坎事件后期，村民亟需一个德高望重的民意代表，而政府也亟需一个理性务实的谈判对象，年近古稀的老共产党员林祖銓成了乌坎抗争的灵魂人物。其实，在9月22日警民冲突和打砸事件之后，林祖銓就被请出来主持大局。在9月23日的村民大会上，林祖銓的发言体现了很高的斗争智慧：“由于群众运动，我们一定要讲政策，摆依据、讲道理，要注意文明，千万不要伤害到人，也不要伤害到物件。第二，我们的行动一定要有组织、纪律，严防个别人趁势搞自己的事物进行报复……我们是乌坎文明的人民，应该做文明的事。”^[44]之后，林祖銓作为“临时代表理事会”顾问，投身到乌坎村民的日常抗争中。12月11日薛锦波猝死的消息传回，乌坎村陷入悲痛与义愤情绪中，抗争的重心转移到为薛锦波讨回公道上来。在这个节骨眼上，林祖銓领导着乌坎村民通过框架转变和框架借用策略，建构了更具可行性的预后框架，使得官民双方有了重回谈判桌的可能。为了回应汕尾市政府“勾结海外势力”的指控，乌坎的行动者们首先要把海外媒体渲染的“起义”框架拉回到“维权”框架上来。所以，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贴告示、接受媒体采访、自发微博、博客）一再重申“我们不是起义，我们不是反共，我们不是分裂国家，我们是单纯的 land 问题”（张建兴微博），“我们就是简单的土地问题诉求，请市府和各界媒体不要再夸张我们的性质”（吴吉金微博）。其次，是要为薛锦波申冤。出于对汕尾市（地级市）、陆丰市（县级市）和东海镇这三级地方政府处理方式的失望，在新一轮的抗争中，预后框架旨在争取更高级权力机关（甚至党中央）的关注与介入。在薛锦波的追悼会上，村民除了继续喊“打倒贪官、还我耕地”，也高喊“乌坎人民冤枉呀”、“请求党中央救救我们”、“青天呀，救救我们”、“中央有青天”、“拥护党中央”等口号。接受采访时，村民表示：“本地政府对我们村民造成了心理伤害，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是忘不掉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省领导，我们的中央领导能

处理此事。”^[45]

用“反贪官不反皇帝”来形容乌坎人的策略并不完全正确。行动者们强调自己就是“党”和“国”的一部分，他们不回避自己的政治身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林祖銮表示，作为一个老党员，与腐败做斗争“无需谦让，这是人民的责任。”^[46]而热血青年团的人则声称“我们是共青团员，我们爱党，我们爱国，我们爱家乡”（张建兴微博）。这里，他们不但灵活运用框架转变策略，也巧妙地借用了国人耳熟能详的“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框架，来对抗地方政府的打压。被拘留村民庄宏烈的父亲庄松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总之有一天，共产党，真正的伟大共产党和真正的党中央主席，爱人民的领导就会给我们伸冤，还一个公道，给一个清白给我们乌坎人民。”^[47]村民们还花了3900元，从北京订购了2500面小国旗、6面中幅的、1面大幅的，还有1面党旗，林祖銮说：“当乌坎人民的胜利到来的时候，要让国旗飘满村庄。”12月21日上午，林祖銮来到陆丰市信访办与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和郑雁雄会谈，表达了乌坎村民的三项诉求：交还薛锦波遗体、安排五家国际著名传媒机构代表亲验薛遗体、承认临时理事会村代表地位，朱明国做出了“五点承诺”。满意而归的林祖銮向媒体表示：“这一次是由广东省副书记朱明国任组长，合起来有将近十位副厅级以上的干部，组织了专家等四十几人的庞大工作组，这规格在我国国内少有。而且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指示和批示过，我相信可以圆满地解决问题。”^[48]林祖銮不断重申对省政府及党中央的信任，强调工作组的“高级别”，既是对官方的善意回应，也是为了给乌坎争取更多的保障。11月21日下午，乌坎村民取消了原定的游行，拆除了路障、撤除了村内的标语和横幅，并且挂上了新的横幅和彩旗“拥护共产党，拥护党中央！”和“热烈欢迎省工作组为乌坎村人民排忧解难！”晚上，村民夹道欢迎省工作组进村。至此，乌坎村民扬弃了“贪官逼民造反”的对抗性话语，转而建构“好官为民做主”的合作性话语，为后续工作创造条件。此后，被拘押村民获释，省工作组调查确认村官违纪，村民土地诉求合理，并宣布重选村委会。乌坎抗争基本取得胜利，林祖銮接受采访表示：“省工作组工作很得力，我们很开心，终于迎来了曙光。”^[49]

七、媒体对乌坎事件的框架化

媒体在乌坎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林祖銮将媒体的作用与村民并列，认为乌坎事件顺利解决的原因，既归功于“村民为了集体的利益高度的团结、高度的协调、高度的组织性和遵守法律的自觉性”，也归功于“媒体公开、公正的报道，使全国以及海外引起的高度关注”。^[50]但是在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12月19日的讲话中，对海外媒体的看法却相当负面：“国外几个烂媒体、烂报纸、烂网站”、“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51]官民双方角度不同，对媒体的评价不一，这不足为奇。在事件平息两年后，再回过头来客观检讨海内外媒体在乌坎事件中所扮演的

角色的确很有必要。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侧重于比较分析不同意识形态背景下媒体对乌坎事件所采用的不同报道方式、新闻源和框架。

基于慧科新闻的检索显示，海外媒体不但最早介入乌坎事件，而且报道量也远远大于大陆媒体。乌坎事件前期（2009年6月至2011年9月20日），因村民上访规模很小，没有引起媒体关注。2011年9月22日第一则关于乌坎事件的报道出现在《汉文新闻》（台湾）上，一天之后，汕尾市政府通告同时出现在大陆国家级（中新社等）、省级（《南方日报》等）和地区级（《汕头都市报》等）16家媒体上。在事件中期，共有115篇相关报道，其中海外媒体的报道量（77篇）是大陆媒体（38篇）的两倍多。如图4所示，报道高峰期出现在乌坎村民的两次游行（9月21日和11月21日）之后一两天。在事件后期，共有674篇报道，海外媒体的报道量（408篇）仍然远远多于大陆媒体（266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2月17日至20日，乌坎事件处于胶着状态时，大陆媒体“鸦雀无声”，而海外媒体则特别活跃。朱明国进村后，大陆媒体才跟进报道，在12月23日一天就有57篇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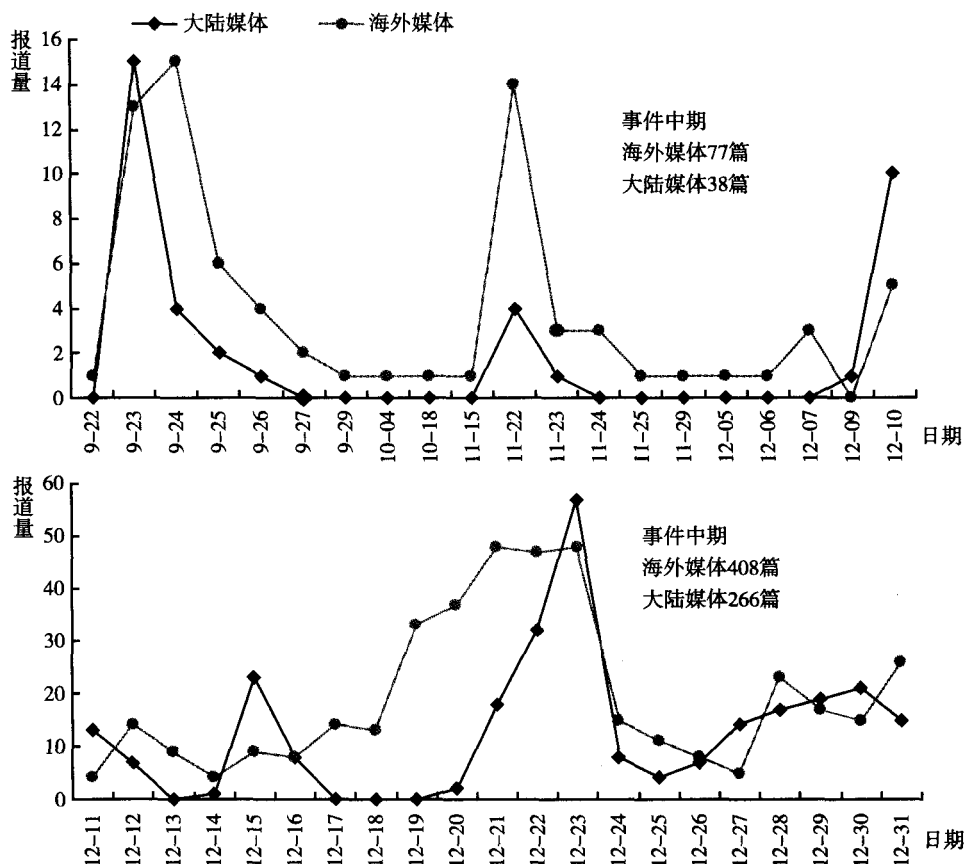


图4 海内外媒体对乌坎事件的关注度比较

在争议性事件中，等政府定性之后，依据官方通报或中央媒体进行报道，是大陆媒体避免口径失误的常规做法（routine）。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信条，大多数媒体仅能在标题和导语上发挥有限的自主性。如表3所示，大陆媒体304篇报道中，自家原创仅有55篇（占18.1%），而转载中央媒体为164篇（占53.9%），官方通报85篇（占28.0%）。不仅消息的原创率很低（216篇中仅有21篇原创，占10%），而且最能体现媒体自主性的评论，也有61.4%（54篇）转载自《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中央媒体。乌坎事发之后，的确有不少大陆媒体记者来到村内采访，但稿子见报时却与最初采访的信息相去甚远，以至于村民悬挂横幅批评媒体“报道不客观、造假新闻”。与大陆媒体形成鲜明对比（ $X^2 = 410.38$, $df = 2$, $p = .000$ ）的是，海外媒体485篇报道中，原创率高达九成（占89.9%），记者各显神通四处采访，多角度展示了乌坎抗争的方方面面。从表3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陆与海外媒体的首要新闻源存在显著差异（ $X^2 = 147.06$, $df = 4$, $p = .000$ ），大陆媒体最为重视官方（占65.3%）的声音，仅有一成以村民为首要新闻源，而海外媒体对官方（占32.2%）和村民（占31%）的声音同样重视。大陆媒体在双重角色扮演（耳目喉舌 VS 舆论监督）上的失衡，显然很难获得乌坎村民的理解与体谅，甚至有村民批评大陆记者“你们没有对人民负责，只对黑官负责，欺骗人民。”^[52]

表3 海内外媒体的原创性与首要新闻源比较

| 原创性 | | | 首要新闻源 | | |
|-----------------------------------|---|-------|-------|---|-------|
| | 大陆媒体 | 海外媒体 | | 大陆媒体 | 海外媒体 |
| 原创 | 18.1% | 89.9% | 村民 | 9.9% | 30.5% |
| 转载中央媒体 | 53.9% | 6.0% | 官方 | 64.5% | 31.8% |
| 官方通报 | 28.0% | 4.1% | 大陆媒体 | 17.1% | 6.1% |
| 合计（N） | 304 | 485 | 记者观察 | 4.3% | 15.0% |
| 统计显著性 | X ² = 410.38，df = 2，p = .000 | | 其他 | 4.3% | 16.7% |
| * p < .05，** p < .01，*** p < .001 | | | 合计（N） | 304 | 485 |
| | | | 统计显著性 | X ² = 147.06，df = 4，p = .000 | |

更有意义的数据来自于表4对海内外媒体在报道乌坎事件时所用框架的比较。我们从四个方面（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义评判、对策建议）来进行了编码。相比于海外媒体，大陆媒体更多地利用“框架化”机制来对乌坎事件进行报道。仅有两成（占21.1%）大陆媒体报道没有明确定义问题，而海外媒体则有一半多（占51.5%）没有明确定义问题；在寻找原因和做出评价方面，大陆媒体的框架化也多于海外媒体；最显著的差异来自于对策建议，超过九成（占91.5%）的大陆媒体报道都对事件的解决给出了一定的建议，而超过七成（占71.3%）的海外媒体没有提出对策建议的有关框架。前面已经提到，大陆媒体大多转载官方或中央媒体，对于

群体性事件，此类通稿往往会言简意赅地界定其性质，交代其前因后果，并通报官方的处理意见。相对而言，海外媒体更侧重于对事件动态的报道（评论除外），不急于定性，并且作为“局外人”，“围观”的立场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就事件的解决给出太多明确的建议。

表 4 村民、大陆媒体和海外媒体的框架比较

| 村民 | | 大陆媒体 (N=304) | | 海外媒体 (N=485) | |
|------|----------|--------------|-------|--------------|-------|
| 问题定义 | 我们不是起义 | 非正常上访/打砸 | 28.0% | 骚乱/暴动 | 15.9% |
| | | 人民内部矛盾/合理诉求 | 51.0% | 和平抗议/合法维权 | 25.2% |
| | | | | 起义起事/新农民运动 | 7.4% |
| | | 无明确框架 | 21.1% | 无明确框架 | 51.5% |
| 因果解释 | 只是土地问题 | 土地纠纷 | 33.9% | 官商勾结贱卖土地 | 40.0% |
| | | 基层政府处理失误 | 26.3% | 村民被打被拘/薛锦波猝死 | 19.4% |
| | | 选举不公 | 8.2% | 反对独裁 | 6.6% |
| | | 有人/海外势力挑唆 | 10.5% | 媒体帮助维权 | 2.7% |
| | | 矛盾积累 | 4.9% | 官民积怨 | 2.3% |
| | | 无明确框架 | 16.1% | 无明确框架 | 29.1% |
| 道义评判 | 乌坎人民冤枉 | 改革样本 | 21.1% | 维权样本 | 2.5% |
| | | 信心希望 | 9.5% | 和平曙光 | 4.1% |
| | | 官员当反思 | 6.9% | 为官当怜百姓苦 | 3.3% |
| | | | | 傲慢地方官 | 6.6% |
| | | | | 人权/人情/人道 | 12.6% |
| | | 无明确框架 | 62.5% | 无明确框架 | 70.9% |
| 对策建议 | 请党中央救救乌坎 | 政府主导调查 | 45.4% | 高层介入 | 11.1% |
| | | 重选村委会/由民做主 | 25.0% | 民主选举/制度改革 | 9.9% |
| | | 协商博弈 | 18.1% | 官民谈判 | 4.9% |
| | | 退地惩官 | 2.0% | 退地惩官 | 2.7% |
| | | 无明确框架 | 9.5% | 无明确框架 | 71.3% |

上一节我们对乌坎村民策略性框架的讨论，主要关注的是他们如何通过诊断框架、预后框架和鼓动框架来进行内部的共识动员和行动动员。配合抗争形势，乌坎村民还试图通过媒体向外传播四点重要信息——我们不是起义、只是土地问题、乌坎人民冤枉、请党中央救救乌坎——它们正好对应了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义评判、对策建议四个框架。从表 4 我们可以看到，大陆媒体对乌坎事件的定性正好是两极分化的，在事件中期，陆丰市政府通稿将之界定为“非正常上访引起打砸”，而事件后期省政府介入后，则将之界定为“人民内部矛盾，村民诉求合理”。海外媒体并没有照搬官方的政治辞令，而是将“非正常上访”框架改装为“骚乱/暴动”框

架，将“人民内部矛盾”框架改装成“和平抗议/合法维权”框架。在一些评论中，海外媒体更是将乌坎事件放大为农民“揭竿起义”，引发“新农民运动”浪潮，这样的“高帽子”尽管能抓人眼球，却违背了村民本意，不利于村民与官方的博弈。

关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尽管海内外媒体都认同“土地”诉求是首要的，但大陆媒体大多以笼统的“纠纷”来形容，不如海外媒体直指“官商勾结”。《人民日报》评论等后期报道，指责“基层政府的失误”（“堵”和“压”）是导致乌坎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海外媒体则更具体地指出村民的怒火是因“村代表被拘以及薛锦波猝死”引发的。从“选举不公”到“反对独裁”，从“海外势力挑唆”到“媒体帮助维权”，从“矛盾累积”到“官民积怨”，尽管境内外媒体看问题的角度大致相同，却通过文字游戏来对框架进行微妙的包装，体现了不同的立场。12月9日汕尾官方通报说“有海外势力推波助澜”、12月19日郑雁雄批评“三烂”，这两次表述都引起海外媒体反弹。一方面，海外媒体对事件归因时，提出“媒体帮助维权”框架来对抗“海外势力挑唆”框架，不无自豪地声称“要维权，先搭上三烂”；^[53]另一方面，海外媒体在做出道义评判时，引用郑雁雄的大段讲话进行冷嘲热讽，塑造出“傲慢地方官”的形象，也有媒体引用朱明国批评官员的讲话“现在一些国家干部哪有想过农民没地吃什么，没地我照吃好粮，不种地照吃好粮，不养猪照吃好肉，甚至不用上街，当着官有人送。他哪里想老百姓之艰难”，呼吁“为官当怜百姓苦。”^[54]

大陆媒体则对朱明国的讲话进行了更全面的报道，不但使用了“官员当反思”这一道义评判框架，而且借朱明国之口提出了“由民做主”这一对策建议框架。大陆媒体的道义评判集中于危机化解之后，以《人民日报》评论为代表，众多媒体将乌坎事件的和平解决视作官员转变社会管理思路的“改革样本”，并引用村民原话（“对政府依法依规处理好乌坎的问题充满信心”^[55]）建构出“信心希望”的正面框架。海外媒体更喜欢从“人情/人权/人道”角度为乌坎村民申冤，将林祖銓和杨色茂加冕为“民主领袖”，并对“维权英雄”薛锦波进行人情味浓厚的特写。

再来看对策建议框架，乌坎村民要求党中央介入的标语、横幅、口号，在大陆媒体的报道中几乎没有出现，媒体把更多的关注投向省政府和汕尾市政府所做的调查，建构出“政府主导调查”解决乌坎危机的框架，并辅助以“重选村委会/由民做主”框架。在评论和专家访谈中，《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和《经济观察报》将乌坎经验推而广之，强调解决群众利益冲突应引入“协商博弈”机制。海外媒体在对策建议方面的思路相差无几，但框架却更为直接具体，比如他们引用了乌坎村民对党中央的求告，指出“高层介入”是解决乌坎事件的关键，并且认为“一人一票”、“全国公平选举”这种制度性的改革才是杜绝腐败的终极手段。

对比村民期望媒体传播的框架和媒体实际传播的框架，以及大陆媒体框架和海外媒体框架，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集体行动组织者对媒体框架发挥了一定的建构效果（frame-building effect），媒体背后的意识形态、媒体的工作惯例、媒体的角色扮

演才是决定媒体框架的关键性因素。在与媒体打交道时，乌坎村民既失望于大陆媒体不敢说话，又吃惊于海外媒体太敢说话，不得不在具体实践中不断调整策略。对于大陆媒体，他们从最初的寄予厚望，但很快大失所望，但事件解决之后，面对新华社、中新社等国家级媒体的采访，他们却相当配合，说了一些有利于官民谈判的“场面话”。对于海外媒体，他们深怀感激之余，又不得不划清界限，尤其是在乌坎事件后期。受到操纵乌坎事件的指控后，海外媒体也主动与村民撇清关系，支付膳食住宿费给村民，而那封要求媒体“正面报道”的《告媒体书》据说也是《明报》记者向村民支的招。

八、结语

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乌坎村民在独特的传播生态场中，根据抗争不同阶段的形势与任务，不断调整抗争性话语的形式与内容，建构出有力的策略性框架，成功地完成了内部动员，吸引了媒体（尤其是海外媒体）的密集报道，并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媒体的报道框架。而媒体对乌坎抗争性话语的选择、再造与包装也是毋庸置疑的。海外媒体的“框架化”似乎更多地为了突出乌坎事件的新闻价值，因此更倾向于从“冲突”和“人情”角度建构框架。而大陆媒体的“框架化”则是等事件尘埃落定之后发掘其宣传价值，更侧重于事件的“定性”与“启示”。

在总结乌坎经验的时候，朱明国曾用“鱼水关系”和“油水关系”来比喻干群关系，^[56]这或许也同样适用于媒体与抗争中弱势群体的关系。究竟是要深度介入鱼水情深，还是应客观冷静油水分离？这不但对媒体人来说是很大的挑战，集体行动的组织者更是需要智慧与经验来面对。在中国农村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中，行动者只能依靠原始的抵抗甚至自杀式表演来吸引媒体的关注，很少能在话语层面展开博弈。而在乌坎事件中，我们看到村民与媒体之间的话语博弈是相当丰富而灵活的。诚然，媒体掌握了话语权，但村民的“依势博弈”以及借助信息传播技术进行赋权实践却为他们争取到了更多的自主权。在海外媒体“如潮水般涌入”的时候，乌坎村民非常清醒地在每一次采访前面强调“我们来自中国乌坎”。起初，他们制作了各种文字、图片、视频资料提供给媒体，追问“你们还要什么，我们全都给你”，但是到了后来，他们更相信自媒体平台（乌坎村民自己的博客、微博），“对于乌坎事件，外面的版本太多太多了，大家还得从正确的渠道去了解。”村民张建兴和蔡义丰在印制自己的名片时，以一百多张记者的名片叠放作为背景，这的确意味深长。行动者与媒体之间，究竟谁是背景、谁是主角，乌坎村民的回答显得相当自信。

本文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抗争性话语研究——以广东省的群体性事件和环保运动为例”（GD11CXW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生

注释

- [1] 张铁：《“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2日，09版。
- [2] 《新农民运动蔓延粤东》，《太阳报》2011年12月20日，A37版。
- [3] Michael Wines, “Revolt Begins Like Others, but Its End Is Less Certain,” *New York Times*, Dec. 16, 2011; Andrew Jacobs, “Land Dispute in China Grows into a Local Revol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15, 2011.
- [4] Pamela J. Shoemaker & Stephen D. Reese,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s on Mass Media Content* (2nd Ed.), New York: Longman, 1996.
- [5] T. A. van Dijk, *News as Discourse*, Hillsdale: L. Erlbaum Associates, 1988.
- [6]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 [7] 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 [8]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 [9] F. 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1; L.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10]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
- [11] 周裕琼：《番禺事件中的抗争性话语初探》，2012年10月中山大学“风险社会与管理”会议。
- [12] 李晨璐、赵旭东：《群体性事件中的原始抵抗：以浙东海村环境抗争事件为例》，《社会》2012年第3期，第180-193页。
- [13] 潘忠党：《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6年第1期，第17-46页。
- [14] Robert D. Benford & David A. Snow,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6, 2000, pp. 611-639.
- [15] Robert D. Benford, *Framing Activities, Meaning, and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The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1987.
- [16] Herbert H. Hanes, *Against Capital Punishment: The Anti-Death Penalty Movement in America, 1972-1994*, New York: Oxford Press, 1996.
- [17] Robert D. Benford, “‘You Could Be the Hundredth Monkey’: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and Vocabularies of Motive within the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 *Sociology Quarterly*, vol. 34, 1993, pp. 195-216.
- [18] Robert D. Benford & David A. Snow,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6, 2000, pp. 611-639.
- [19] D. A. Snow, E. R. Jr. Rochford, S. K. Worden & R. D. Benford,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1, 1986, pp. 464-481.
- [20]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 [21] 黎相宜：《精英型与草根型框架借用：比较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的集体抗争》，《社会》2009年第6期，第107-126页。
- [22] Yuqiong Zhou & Patricia Moy, "Parsing Framing Process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Media Covera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7, no. 1, 2007, pp. 79-98.
- [23] 陈先兵：《维权话语与抗争逻辑：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6页。
- [24] 曾繁旭：《国家控制下的NGO议题建构：以中国议题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9年总第8期，第19-53页。
- [25] Dietram A. Scheufele, "Framing as a Theory of Media Effe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9, no. 1, 1999, pp. 103-122.
- [26] Robert M. Entman,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3, no. 1, 1993, pp. 51-58.
- [27]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 [28] 孙玮：《“我们是谁”：大众媒介对于新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感建构——厦门PX项目事件大众媒介报道的个案研究》，《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第140-148页。
- [29] 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
- [30] 慧科新闻数据库成立于1998年，涵盖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及新加坡、美国等1600多家媒体的数据。
- [31] 丁未：《中国信息社会下的“都市里的村庄”——社区传播个案研究》，《中国传媒报告》2010年第2期。
- [32] 本文用楷体字标注的引用文字，除特别注明，均来自我们对乌坎村民的访谈。
- [33] Doug McAdam, "Recruitment to High-risk Activism: The Case of Freedom Summer,"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2, no. 1, 1986, pp. 64-90.
- [34] Ralph Turner & Lewis M. Killian, *Collective Behavior (4th Ed)*,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93.
- [35] 刘建锋：《乌坎密码》，《经济观察报》2012年6月9日。
- [36] Ralph L. Rosnow, "Rumor as Communication: A Contextualist Approa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8, no. 1, 1988, pp. 10-27.
- [37] Tamotsu, Shibutani, *Improvised New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umor*,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6.
- [38] 周裕琼：《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 [39] Robert H. Knapp, "A psychology of rumor,"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8, 1944, pp. 22-37.
- [40] Hervert G. Blumer, "Elementary Collective Groupings," in A. M. Lee, Eds., *New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1946, pp. 170-177.

- [41] 《乌坎村民囤石块预备拼命》，《新报》2011年12月20日，A10版。
- [42] Gordon W. Allport & Leo J. Postman, *The Psychology of Rumo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47, pp. 141.
- [43] 这段对话引自张建兴等拍摄的纪录片《乌坎！乌坎！誓保祖地》。
- [44] 这段对话引自张建兴等拍摄的纪录片《乌坎！乌坎！誓保祖地》。
- [45] 《乌坎村支书村长被解职》，《信报财经新闻》2011年12月23日，A16版。
- [46] 《林祖銓：这是人民的责任》，《太阳报》2011年12月22日，A06版。
- [47] 引自艾晓明拍摄的纪录片《乌坎三日》。
- [48] 引自艾晓明拍摄的纪录片《乌坎三日》。
- [49] 《村民代表：农民利益获政府正视》，《文汇报》2011年12月31日，A08版。
- [50] 引自艾晓明拍摄的纪录片《乌坎三日》。
- [51] 游清源：《中国官场人物——郑雁雄》，《信报财经新闻》2011年12月24日，C09版。
- [52] 引自艾晓明拍摄的纪录片《乌坎三日》。
- [53] 冯志丰：《要维权，先搭上三烂》，《星岛日报》2011年12月23日，A14版。
- [54] 吴之如：《为官当怜百姓苦》，《竞报》2011年12月29日，N30版。
- [55] 李强：《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乌坎村与村民代表交流》，中国新闻社2011年12月23日。
- [56] 《一些干群是“油水关系”》，《南方农村报》2011年12月29日，03版。

journalism.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impact of full-time reporters in Shanghai was still constrained by the overall low level of news professionalism at that tim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rise of full-time reporter and the fall of part-time reporter became long and complicated.

46 Strategic Framing vs. Framing Mechanism: The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Contentious Discourse in the Wukan Event

· *Zhou Yuqiong, Qi Fapeng*

Transition, structure and discourse are the three macro-factors underlying social movements. Regarding transition and structure, much has been don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but as for discourse, little has been done from the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As an initial attempt, this study tries to conceptualize the repertoire and connotation of contentious discourse, and explores the discourse involved in the Wukan Event on the basis of data collected by fieldwork, in-depth interviews, content analysis and text analysis.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are examined: 1) What kind of contentious discourse appeared in Wukan's particular communication ecology? 2) How did Wukan villagers employ the strategic framing processes to mobilize collective actions? 3) How did mainland and overseas media employ the framing mechanisms to report and interpret the Wukan Event? The discourse-gambling scenarios are rich and diversified in the Wukan Event, and among them, villagers' discourse empowerment on We Media platforms is particularly impressive.

70 Empowerment or Disempowerment?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Social Identity in a Tibetan Village

· *Chen Jingjing, Cao Yunwen & Zhang Yunxiao*

Regarding empowerment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wer and power flows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identit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file the stratification, power concentration and resource flows in a Tibetan village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analyses the impac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ass media and the use of ICTs for empowerment. The authors realize that empowerment is a process deeply influenced by social structure, power relationships, cultural norms, identity and other contextual factors. The village in the study had shown a significant stratification and concentration of power and resources. Moreover, as one of the results of primogeniture and widespread arranged marriages, a poor and powerless class had shown up. The right to media access and ICTs had been co-opted into the power structure, extending, or